



TIE-DAO SHI JIA

铁道世家

第 一 章

十月里的一个黎明，一列由江北摆渡过来的煤车，缓缓地驶进了江堰车站。

车停下了。前面的车头还没摘去，在列车中部的一节高边煤车里，突然探出一个十三、四岁孩子的头来。这孩子脸上沾满煤灰，鼻和嘴都分不出来，只有两只大眼睛闪出机灵的光。

孩子迅速、机警地对车下扫去一眼，确信车边没有人，这才一纵身翻上了铁车梯，象个猴子似地顺梯子溜下车来。接着，他又以极快的速度钻过几个车底。这孩子钻车底似乎很有经验，不仅来得快、不让车钩碰着头，还不时朝站台的两头望，看信号，看有没有车头驶来。

十分钟不到，他就人不知鬼不觉地绕出了三叉口车站东头的扳道房，来到站外信号机下。这时候，他不象刚才在煤车上和站里时那么紧张了。他在一个映着晨星的水塘里洗去头和脸上的煤末，然后又捱回路基，在冰凉的钢轨上坐下来歇息。虽然只是中秋季节，但这孩子在敞篷车里顶着风露颠了

一宿，衣着又单薄，浑身早没有一丝儿热气，习习的晨风吹着，他不由得直打冷颤，腹中饥饿得难过。坐了不到两分钟，他便从钢轨上站起来，沿着道心，向闪着寥落灯光的市区走去。

前头，就是江城站，离这儿有三公里。

“我先上肖家去，把妈妈生病的事告诉二爷爷，回头就去分局找熊梦堂要生活费。”孩子踏着道木朝前走去，边走边想着。“熊梦堂那舜种，这次再不给生活费，我就上北京告他去！我是他生的，他凭什么不养我？哼，他当了分局书记，就没人管他啦？！”

他是个不幸的孩子。亲生父亲熊梦堂遗弃了他和他的妈妈。他听妈妈说过，妈妈生他以后不久，当时还是个普通工人的熊梦堂，就在外面勾了野女人，每月领到工资后从不交家里半文，一年到头在外鬼混，即便偶尔回来，也是和妈妈吵闹，无事生非。他想用这种手段逼迫妻子先提出离婚。软弱的妈妈为了顾全这个早已名存实亡的家庭，年复一年地忍受着折磨。妈妈流过多少伤心的眼泪呵。好在，那时熊梦堂还不能无法无天，法院管，单位上也管，就说他的生活费吧，不用妈妈出面，会计室按期由熊梦堂的工资里扣下来。那会儿，他们母子生活还不困难，妈妈在站上当广播员，每月有三十多元的收入。

到他懂事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熊梦堂造反起家，一跃成为铁路分局最有权势的人，终于把他和妈妈都扔了。熊梦堂不给生活费，会计室也再不敢扣。国家乱了，开车的不开车，上班的不上班，四下里搞武斗，三天两头停电、断水、供应紧张，物价上涨，单靠妈妈的微薄工资，他母子度日显得紧张了。可是，这还能对付。两三年里，妈妈咬了咬牙，没有提起过找熊梦堂要他的生活费。后来，他上初小三年级的那年，母子俩突然大难临头。妈妈因广播一篇批判文章，错把“刘少奇”念成“毛主席”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开除了路籍，押送回农村监督劳动。分局还特地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宣布这个决定，把妈妈狠狠斗了一场。处理得这么重，不用说，这后面隐藏着熊梦堂的意图。他名正言顺地与反革命分子离了婚。从此，松亭失学了。他和妈妈离开了江城市，背着天大的罪名回到了淮北老家。

他和妈妈被押到北方农村的那天，正是北风呼啸、雪花飘飘的严寒日子。那儿虽是妈妈的故乡，有几房远亲，有妈妈儿时的朋友，可是在那一整天里，没有一个人来看望他和妈妈。母子俩被安置在村头一间看青用的破草屋里。木板门上破了一个大洞，年久失修的土墙八面透风。晚上，娘儿俩都没吃饭，妈妈哭了，他也哭了。

深夜，他困了，就和衣偎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。

“汪汪，汪汪汪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阵狗叫声将他从梦中惊醒。他睁开眼，草屋里没有灯亮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。他用手一摸，妈妈不在身边了，他身上的衣服已被脱去，一个人躺在被窝里。

“妈妈！妈妈！”

他尖声地呼唤着，泪水贴着瘦削的脸颊流下来。他爬出被窝，赤着脚向外边跑去。妈妈！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不能没有妈妈呵！

一出屋，他吓得愣住了！借着雪地的反光，他看到妈妈站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。她身边的一枝树杈上，垂下一个绕扣的绳套。妈妈没穿棉衣，头发披散着。

“妈妈呀！妈妈呀！”

寒风挟着雪花打在他的身上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哭喊着，光脚踩着雪没命地跑过去了。

可怜的母亲听到儿子的哭叫，泪水模糊的脸慢慢转了过来。

“松亭，可怜的孩子，妈也不愿扔了你呵！”妈妈一把抱住他，肝肠寸断了。“妈妈活着是为你，妈死，也是为你呵，妈不能叫你跟着受罪，他们说妈是反革命，妈活着，连累你呀！”

“妈妈，你别说了，你是好人呀，你不是反革命！熊梦堂害你，熊梦堂那坏蛋是反革命！呜呜呜呜……”

“孩子，是妈害了你呀，往后咱娘俩的日子怎么过呀！”

“妈妈，好妈妈，你为了我活下去吧，我一辈子跟着你，不离开你，我要挣钱养你！”

“我的好孩子，我可怜的孩子！……”

从此，母子俩相依为命，在生产队里靠挣工分生活下来。为了活命糊口，母子俩拼命地劳动。两三年下来，穷愁交加的妈妈得了急性肝炎，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他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身上。实在没有办法，他只得去找生身父亲要生活费。可是熊梦堂推得一干二净，倒是姑姑的婆家，经常给他母子俩一些资助。

姑姑的婆家姓肖，一家人祖孙三代都是干铁路的。姑姑的公公叫肖震山，是肖家长辈兄弟中的老二。按辈份，松亭称肖震山二爷爷。他尽管还小，不大懂事，可他知道二爷爷一家都是好人。自他和妈妈回到农村，二爷爷家里时常有人来乡下看望他母子俩，每回来，总是不声不响地丢些粮票和钱。今年夏天，铁路上贯彻落实中央九号文件，提出要整顿交通运输。二爷爷一到江城站当书记，没断头地差人来乡下了解他们母子的生活情况。站上来

的人，不止一次对妈妈说，组织上已在研究，准备要妈妈回去上班了。可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至今妈妈还是没能回去。

是的，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，都不是他一个孩子所能懂得的。

天见明的时候，松亭跑到市区靠西头的铁路街，沿着这条不长的街一直走到尽头，最后进了铁路大院。这大院因为没了院墙，一览无余的房舍显得很凌乱。那截只剩下二、三尺高的断墙，横在街边，成了垃圾场，成群的鸡在垃圾堆上刨食。院里的地面七步一坑、十步一洼，坑洼里汪着水。

这座住满铁路职工家庭的大院，是解放初盖起来的。一排排规则的平房，碎石子铺的甬路两边栽着高大的梧桐树，院子中央是一个面积不大却水清如镜的荷花塘。那塘里年年开花结藕，鱼也甚多。自文化大革命中打起派仗，前后大门全被拆毁；围墙的砖被扒走，盖了小厨房、鸡窝；路灯不亮，树木枯的枯，砍的砍，差不多也完了；荷花塘变成了烂泥塘。有些小孩子也跟着趁火打劫，把属公用的房舍，象门房、浴室、厕所等地，房上的瓦掀去，玻璃砸得稀碎，灯泡儿摘了。就连男女厕所间相隔的那堵墙也打通了。至今，这座大院都还没能恢复元气。

进了大院，松亭穿过几排平房，径直来到一个

有竹篱笆的庭院前停住。那门牌上标着：

铁路大院56号

这就是他姑姑的婆家，江城站党委书记、革委会主任肖震山的住处。

这套祖孙三代铁路工人的住宅，是普通的灰砖平房，栗色的门窗，门前有几级水泥台阶。房间并不宽敞，除厨房外只有三间正屋。肖震山因为家中的人口多，只好将堂屋两侧的东西房全部隔开。这样，就多出两间。

竹笆院里，紧靠房檐栽有五、六棵拳头般粗的杉树，树下摆着十来个花盆，种着仙人掌、月季、鸡冠花、兰草之类。这时节，鸡冠花还没有枯萎，月季花正盛开，花瓣上滚动着晶亮的露水珠，散发出一股股清香。

松亭自记事以来，对这个人家就有了很深的印象。早先，妈妈还在站上当广播员的时候，就时常领他到这儿来玩。后来，他们回到了乡下，妈妈很少来了，但他却因找熊梦堂要生活费，仍然时常来江城。每一次来，他总是在这里落脚，看看二爷爷一家人。他非常熟悉二爷爷家里的情况。他知道西屋前半间住着二爷爷和奶奶，后半间是二爷爷的小女儿住；东屋里，前半间住着七十多岁的老爷爷跟二爷爷的第二个儿子，后面的那半间，就是他姑和姑父的了。住房不宽裕，一来借宿的亲友，就得在

堂屋里临时搭铺。

这会儿，竹笆院里的地面已扫得干干净净，门半开着，显然是有人起来了。小松亭没有立刻推门进去，他立在竹笆外面，目光不安地朝四周瞥了一眼。天虽然亮了，家家户户的房门都还关着，除偶尔有几个挑粪的近郊农民、赶早车的职工和挎小篮子奔菜市的人匆匆走过，此外再不见别的人影。由江堰站和码头那边传来几声机车和轮船悠长的笛鸣，愈发使人感到清晨的寂静。

一时，松亭心里犹豫了：这么大早赶来，是进院喊门好，还是去铁道街上溜一圈，回头再来好呢？

事也凑巧，就在他踌躇不决的当儿，堂屋的房门拉开了，接着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五十四、五岁的女人。这女人高个头，曼长脸，着一身旧蓝布衣服。她乌黑的头发中夹着缕缕银丝，眼角布满了细密的皱纹，母性的眼眸里，不时地闪动着善良、温厚的光。

她就是肖震山的妻、姑姑的婆婆——梁秀英，这个大家庭的主妇。

“哟，松亭呀，”梁秀英刚出房门，不等松亭开口，一眼就看见了他。“孩子，你是跟哪趟车来的？还站在院外作啥，赶快进屋吧！”

松亭喊了声奶奶，一句话没说，就被梁秀英拉

起一只手，领进堂屋去了。

屋里的地也扫过了，桌椅、茶具、镜框、窗子都擦洗得干干净净。东屋的门大敞着，西屋的门开了一半。

“松亭，你饿了吧？……”

“奶奶，你别忙，”松亭懂事地打断梁秀英的话说，“我不饿，我真的不饿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，坐了一夜的车能不饿？等等，我叫肖虎去给你买烧饼、油条……”她疼爱地摸摸松亭的头，这才看清松亭的脖颈、眼圈、鼻孔和耳朵眼里还有煤屑。“唉，你又是扒煤车来的呀？一宿坐在敞车上，还不冻坏了。松亭，听奶奶的话，下回再别扒车了，那上面危险……”

“奶奶，你在和谁说话呀？”

突然，东屋里传来了梁秀英的长头孙子肖虎的尖叫声。

“肖虎，快起来，替你松亭哥买烧饼、油条去。”

梁秀英的话刚一落音，一个六岁的男孩子就穿着小裤叉、天蓝背心，光脚从东屋里跑出来了。

“松亭哥，我早想你啦！”肖虎一把搂住松亭的脖子，亲昵地嚷着。“这回来别走吧，咱俩在一块儿玩，在一块儿睡，在一块……”

“别闹出病来，快回屋穿衣服，”梁秀英拉开

肖虎说。“待会儿拿个小篮子上街去，迟了可买不着。”

肖虎对松亭挤了挤眼，一头窜回东屋去了。

说话间，肖震山一边扣着衣钮，从西屋里走出来。他的个子比梁秀英还高出一头，长方脸，粗眉大眼，胡子密密茬茬的。宽大的前额上，横着一道触目的抬头纹，头发有一半发白了。这是一张饱经风霜和忧患的脸。

“二爷爷！”

松亭喊着，赶紧要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但被肖震山一把按住了肩头。

“你妈身体好吗？”肖震山问，他的声调低沉有力。

梁秀英也添问了一句：“粮食够吃的吗？”

“二爷爷，奶奶，妈妈又犯肝病……呜呜……”关切的询问触动了松亭的伤心处，他忍不住哭了。“家……家……里，到麦口都……没有粮食，呜呜……妈妈不让我告诉你们……”

见这光景，肖震山锁起了眉头，别的也没有再问下去。梁秀英背过身子，撩起衣襟，在眼角上擦去了一颗泪珠。

肖虎穿好衣服，找梁秀英要了钱和粮票，硬拉着松亭一块儿上街去了。

剩下老两口在屋里，啥话也没说。肖震山直到

吃罢早饭，临出门的时候，才瓮声瓮气地问道：

“家里还有钱没有？”

梁秀英朝男人点点头。

“给孩子想法对付点粮票，先带五十块钱去。”

肖震山说完，便倒背两手，低着头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走出屋去。

梁秀英随后也出了屋，一直随男人走到竹笆下，才收住步，轻声在后说：

“震山，昨晚我就和彩凤说了，要她今早下班买些鲜肉回来。你看是晌午包，还是傍晚包好？”

肖震山侧身看女人一眼，没吭气，便蹑蹑走开了。虽没说什么，可梁秀英懂得男人看她的意思，那分明是责备她：

“你是怎么啦，一大清早，没话找话说，你也不想想，站上这么乱糟糟的，我能按时候回来吃你的饺子？”

确实，她说了一些多余的话。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她已养成了习惯——当男人走出竹笆院时，她总要交代两句什么。尽管她也知道说出的话没多大意思，她还是说。仿佛，不讲些啥，她心里就不安宁似的。

肖震山一言不发地走了。梁秀英没回屋，她就站在竹笆院下，目送着肖震山那高大厚实、略有些

前弓的背影，在她的眼前渐渐远去。一忽儿，她仿佛看到当年的肖震山在车站里卖烟卷，因得罪路警而遭到缉捕，没命地穿过站上的铁丝网，向荒野里跑去。他的小褂儿被铁丝网撕破，她躲在没人的地方，站在他的背后，替他一针一线地缝起来。一忽儿，她又看到肖震山和老三震林跟着叔叔在数九寒天的深夜里，扒上飞快的火车，去掀鬼子车上的东西……过后，她又看到了将她抬进肖家去的那顶轿子。在这个家里，她先后生养过四个孩子。在生大孩的月子里，家里断粮，她冒着蒙蒙细雨去地里挖野菜，他愤怒地强把她背回家来，到家一看，婴儿已经死了……她想起解放翻身，想起肖家人多次幸福地团聚……接下，她的眼角一个突跳，她又看到了造反的红旗，戴着红臂章的人们呼叫着冲进竹笆院，给肖震山戴上三反分子的高帽，不由分说拖上了街……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

说不上为什么，这些年，她总不能放心他。特别是今年，他被任命为江城站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，她愈发地为他担心了。每天一早，肖震山上班，她得送他走出竹笆院，然后又一声不响地目送着他走出大院去。到晚上，她就站在这儿守望，等他从站上回来。他因事不能按时到家，她就一遍一遍往站上挂电话。逢到儿子、女儿在家，她把他們赶上街去张望。这些日月，她的心似乎就拴在他身

上，他上站了，她的心也跟着去了。这是不是早年就有的习惯呢？不，不是！她一天不断地这般迎送着他，这种心理，这种感情，那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才有的呵。

是的，要说过去，她对丈夫可是从来没有过这种深深的牵挂。远的不说，文化大革命以前，肖震山在北站任车务段段长、地区党委书记，有时早出晚归，有时一撂三、五天才回家一趟。隔江渡水的，她从没打过电话探问，也没在竹笆院下守过他。再说远一些吧。一解放，肖震山在津浦北段一带的站上干值班员，后来当主任、站长，隔两日就是一个夜班，天冷天热也罢，刮风下雨也罢，他上班去了，她睡她的觉。那时节，不论丈夫还是儿女们，她对他们的工作从没烦过神。她关心的只是这个家，全部的精力，都操持着过日子。实在说，她压根儿用不着为他们操心。当书记、当站长、开火车、打旗、跑车，反正都离不开铁路。她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，可她随着男人从旧社会熬到解放，随着他在铁路上奔波过好几十年，从津浦北线到南线，从淮南线到南江线，她搬过记不清回数的家，换住过记不清个数的车站。他到哪，她跟到哪；他调动，她搬家。自己的两儿一女，自幼儿在铁路学校上学，毕了业就上铁路干活；家里来往的亲朋，也多是铁路职工。对铁路上的事情，她还有什么不

清楚的呢？往年，她一直在心里这样想：他们干他们的工作，她管她的家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操持这样一个大家可不容易呵。这个家，上有七十多岁的叔叔，中有震东、震山、震林三个老兄弟，下有她自己的二儿一女。大儿明正与彩凤成亲，添了小孙孙肖虎，说起来已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代了。她在这个家中，要当妻，又做娘；既做下，又当老。一家人全仗她照顾，一睁眼，大人、孩子都向她要吃的，穿衣要她筹划，开销得她打发，还有洗呀浆呀的，儿女小时得念书，大了得张罗婚事，添了孙子扔给她。哪一桩事，不得她操心、安排呀！此外，还得用相当的精力考虑家中的关系，婆媳间和亲家间的相处。难是难，累是累，可她心里是甜的。一家人没病没灾，拢在一块儿，亲亲热热地这些年，好歹她觉得对得起姓肖的一家人了。

说心里话，早先她也有牵挂，不过不是为震山。她最惦记的人，是震山的老兄弟震林。那时候，大哥、大嫂在铁道部一个局里工作，家住北京，在事业上蒸蒸日上，没什么需要她这个弟媳妇牵挂的。震林一直担任车长，长年跑车，自死了媳妇再没娶，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外，怪可怜的，她觉得做嫂子的有责任多关心点。震林媳妇丢下的一个孩子，是她一手拉扯大的，她疼爱这孩子胜过自己的骨肉。文化大革命前一年，这孩子在一次铁路施

工事故中牺牲了，她哭得死去活来。可是即使是这样大的灾难，当时的她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心。

这几年来，她渐渐感到操持不住这个家了。肖震山三兄弟、老爷爷、直到年轻儿女们所发生的变化和遭遇，使她再不能只管埋头过日子，一颗心时时悬在半空。以往，她这个家庭妇女懂得啥呢？她只知道毛主席、共产党是穷苦人民的大救星，只知道新社会好、社会主义好，这就是她的全部政治思想了。文化大革命突然来了，大动乱波及到她的家，严峻的现实生活摆在她的眼前，意想不到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了。肖震山成了三反分子，哥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打成叛徒，先后不明不白地死去，大儿子明正因扣压武斗列车，一度间，曾被造反派当做现行反革命四处缉捕……她生平第一遭关心起国家大事来，以如饥似渴的心情去祈求弄懂所谓政治是怎么回事儿了。不过，难呵！尽管她非常关心政治，七、八年下来，她却是越来越糊涂了。那些人们一张口就说出的各种新词儿，象“阶级斗争”、“资本主义复辟”、“修正主义”、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等等，她总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周全。她觉得这些和自己的生活简直就不沾边儿。

她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，把心拴在了肖震山的身上。

肖震山的身影在大院外面的街道上慢慢消逝了。梁秀英还是没有回屋去，她将身子靠在竹笆上，心里老是丢不下他。

提起肖震山，这几年来日子过得可不顺心。文化大革命一来，他和多数干部的命运一样，戴上了纸糊的高帽，被人象狗似地赶着出去游大街。这也罢了，有什么法子呢，那会儿就兴那个潮流。俗话说，人要随着潮流走。可他偏不，固执，任性，硬得象石头，说什么也不肯“低头认罪”。有一回，造反派在分局揪斗“走资派”，他和一批地区、站段中层干部够不上“走资派”资格，被赶到会场受教育。当时，主持大会的一个造反派头头邹小六，绰号“活土匪”的，因念肖震山的大儿媳是造反兄弟熊梦堂的妹子，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，有意拉他一把，在会上点名道姓要他上台揭发。“老肖，你别软不拉嘎的，俺造反派了解你，你这个地区党委书记，芝麻官儿，也和俺造反派一样是受压的嘛！今天，批斗分局走资派，俺让你打头炮揭发！”显然邹小六这是赏给他一个“亮相”的机会，只要他应声上台，装模作样地控诉和揭发一番，就好过关。可他，就是不领情。他听了邹小六的招呼，头也没抬，坐在凳子上不动窝。“老肖！俺让你上台揭发，你怎么按兵不动？怕熊，俺老邹给你撑腰！”经不住邹小六一再催逼，他站起来了。“要我说，